

1-12

歐洲漢學：精神遺產與未來發展趨勢 ——初步探索*

European Sinolog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ts Legac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魏思齊 (Zbigniew Wesołowski SVD) **

導 論

歐洲漢學已有 400 多年的歷史。回顧其歷程與追求其精神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過筆者根據自己及其他歐洲漢學家的研究成果與經驗，願意在此對其做一簡單梳理。這裡我們所謂的「漢學」¹ 為英文「Sinology」的翻譯（由「Sino-」表示「中國的、中國人的、漢語的」，來自拉丁「Sinae 中國」，阿拉伯語 sin，波斯語 chini 梵語 cina[-s]，今日英文「China」也是如此，其詞源大概來自「秦朝」（西元前 221-206）及「-logy」，希臘語表示「研究」、「探索」或「學說」組成）。漢學乃指外國人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等方面研究所得

的學問，即外國人對中國的認識。² 更恰當地來說，它是以實際漢語（尤其書面語言 / 漢字）為基礎，對中國文化的任何層面進行研究並獲得研究成果。那麼，歐洲人對「漢學」這一學科領域有什麼進一步的理解，及在其歷史脈絡中對中國的認識過程又是如何呢？

一、歐洲漢學概念與其歷史發展脈絡

現在，首先讓我們對「漢學」概念做一些說明。一個學術領域的科學性或學術性之標準，在於如下幾個方面：1. 研究對象；2. 研究方法；3. 理性上的可信度；4. 術語層面（專業名詞、專用名詞）；5. 相關學科領域中

* 此論文先發表在「2010 國際漢學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6 月 24-25 日）。筆者感謝中國大陸靖保祿博士校對此文章。

** 作者為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主任。

- 1 中國人翻譯「Sinology」為「漢學」，其實「漢學」概念本身至少有四個意思：1. 漢代學者研究經書，注重考據，故後世稱「樸學」、「考據」之學、「訓詁」之學為「漢學」（與宋代義理之學「宋學」相對）；2. 清代自乾嘉時期（1735-1820）由惠棟（1697-1758）確立「漢學」，清儒相繼致力於輯述漢儒古訓，藉以解釋經傳，於是「古義」成為表徵「漢學」典範的一種解釋類型。依漢儒舊注以演述新疏，區別於十三經注疏而另撰新注疏，這可說是清代經學的主流趨勢，其實即始於「古義」之作。而且，依章炳麟（1869-1936）、錢穆（1895-1990）等學者考察，「漢學」的學術典範不僅侷限於左氏學或《穀梁》學，對於凌曙（1775-1829）、陳立（1809-1869）之《公羊》著述亦有不可忽略的影響，甚至莊述祖（1751-1816）、魏源（1794-1857）、龔自珍（1792-1841）等常州學者，也未脫由訓詁而典章制度而探索微言大義的通經進路；3. 本論文所用的概念，即外國人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等方面的學問；4. 在臺灣日據時代中，做「漢學」代表漢人（華人）愛國的態度之一，即共同閱讀與討論中國經典，如此保持中國人的自我認同。
- 2 在中國大陸，外國人的漢學叫做「國際漢學」或「海外漢學」，曾經有史學家、地理學家及教育家張其昀（1901-1985），代表一些中國學者，認為西方所謂「Sinology」應為「華學」，而非「漢學」，因為西方學者把藏學（Tibetology/Tibetan studies）排除在「Sinology」之外，有造成破壞中國統一之嫌，而「華學」不僅研究漢學，也研究中國少數民族之學。

國立教育資料館
教育資源服務中心
恕不外借

國立教育資料館
教育資源服務中心
期刊專用章

030
3/25/3 請上學研究通訊 30:1 (總
25/2) c6-k 宋子平

的內容整體（系統）。³

在研究對象方面可分兩個部分：1. 實質對象（實料／具體對象），2. 形式對象（即研究的立場、觀點、角度或視野）。漢學研究之實質對象為中國文化及其所有面向。此研究對象本身很廣，包括漢族生活之所有層面（如生活環境、物質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心理生活、思想、藝術、倫理生活、宗教信仰生活等精神生活）。漢學之形式對象來自學者對所研究之問題的態度和觀點，如此我們可以有哲學的、歷史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立場。這樣，漢學就趨向於成為一種「交叉科學」。⁴

研究方法是科學性或學術性的核心問題。漢學屬於人文科學領域，所以傳統的、古典的或以前的漢學重點在於：以實際的中文知識為基礎進行研究。⁵ 這樣的漢學範圍較為狹隘，為一種中文的語文學，並運用語文學之方法進行研究。不過，漢學作為一種「交叉科學」，也運用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之方法。所以在方法向度上，更可以體會到，作為「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漢學（即：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⁶ 與西方學術界的專業學科領域之間的張力關係。

這牽涉到「Contemporary China」（當代中國）現象與「Area Studies」（區域研究）的問題意識。1959年1月

《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年報》（*Annal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以中國為主要內容出版特集“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hinese”（當代中國及中國人），其導論中 Howard L. Boorman 於綱領性內容中提出：「在此種情況下（共產黨的中國作為當代亞洲政治主要因素，及西方傳統中國研究以歷史與人文科學為主），美國大學目前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發展對當代中國問題以更甚經驗及分析的研究方法，與擴大社會科學領域的使用，為了研究非西方世界的主要的及尚未相當探究的部分。」⁷ 推動此種研究走向的聲音並非只有美國才有，還有代表西方國際漢學團體的新論述，譬如法國於1959年1月1日創立 Documentation Centre on Contemporary China（當代中國檔案中心），其負責人為 Jacques Guillemaux（紀業馬，1911-1998），1953年他已經創辦了當代中國研究機構，之後才有相關資料中心；在英國漢學方面也有類似的發展，而在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歷史部分有一種任意性的分野：traditional China（傳統中國）、modern China（近代中國）與 contemporary China（當代中國）。Contemporary China 意謂著自1949年至今；modern China 主要意指1850年代至1950年代（即中國與西方衝突[鴉片戰爭]至共產黨於中國之興），而 traditional

- 3 關於漢學的學術性問題，參閱 Hans Kuijper 的〈對中國研究的批判性分析〉，載於林志明、魏思齊編輯，《輔仁大學第二屆漢學國際研討會「其言曲而中：漢學作為對西方的新全釋——法國的貢獻」》（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5），頁361-405。
- 4 與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領域的知識體系有密切聯繫，並借助它們的成果而發展起來的綜合性科學門類，如生物物理學、生態經濟學等。交叉科學的生成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某些重大的科學研究的課題涉及到兩個或兩個以上學科領域，在研究過程中，便在這些相關領域的結合部分產生了新興學科。另一種情況，是運用一門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去研究另一學科領域的問題，也會形成一些交叉科學。其實，漢學屬於第二種情況。請參閱杜維明，〈1. 漢學、中國學與儒學〉，載於杜維明（周勤紀錄整理），《十年機緣待儒學：東亞價值再評價》（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1999），頁1-33。
- 5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in westlichen Staaten”（西方國家漢學），載於 *China Handbuch*（中國手冊）（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Franke unter Mitarbeit von Brunhild Staiger, Düsseldorf: Bertelsmann Universität 1974），1230 欄。
- 6 我們也有「China Studies」的說法。這個最近流行的語詞好像是「中國學」一詞彙的劣譯，回應中國人的「國學」。「國學」也意譯為英文的「Sinology」。狹義的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現在一般提到的國學，是指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為根基，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並歷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學術體系。因此，廣義上，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文化和學術，包括歷史、思想、哲學、地理、政治、經濟乃至書畫、音樂、術數、醫學、建築等都是國學所涉及的範疇。「國學」指學問一說，產生於清末「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原稱「中學」，後改稱「國學」。它興起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思想學術自由逐步改善，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的空間逐步擴大，1980年代後「國學」復起至今。
- 7 參閱 Yves Viltard, “The Birth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rchaeology of an American Sinological Determination”（「當代中國」的延伸在美國：美國漢學決定性之來龍去脈），載於 *China Perspectives*（中國視角）25（1999），頁60（筆者譯）。

China 則是指 1850 年代之前的中國。無論我們如何去判斷此歷史分野的任意性，它明確地開始表現出漢學（傳統中國）與中國研究（近代與當代中國的研究）分裂。另外，我們可以發現 contemporary China 作為對中國自 1949 年以來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之轉喻，其所代表的內容是在 1958 至 1960 年間，成為一種流行的課題，在此論述中出現了較普遍的問題意識——即專業化（專業知識）之認識論上的問題。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亞洲研究期刊》）曾在 1964 年及其後多次就學術之區域研究和專業學科領域之關係進行討論。⁸ 此論戰至今沒有終結，其實也無法結束。從方法論來看，漢學要提升研究方法方面的問題意識與敏銳度。自歷史脈絡來看，因為現代科學精神或學術研究方法來自西方，所以，漢學要注意中國傳統中是否有其獨特的思想或研究方法之模式。另外，還有與以上議題相關的基本問題：即在西方科學或學術方法論之外，是否有其他選擇？此問題跟理性上的可信度也有密切關係；有關漢學方面的術語或專業名詞，其大部分來自無法準確翻譯為西方文字的詞語，譬如「義」、「道」或「心」。所以，用拼音來表達它，也是在漢學歷史脈絡中幾乎從開始即認為較為妥當的方法。

以上是對漢學概念初步的釐清，現在讓我們觀察歐洲漢學的歷史發展脈絡。在歐洲，嚴格意義上的漢學研

究已經有 400 多年的歷史。自 16 世紀中葉始，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傳教士東來，而形成了一股傳教熱。客觀上講，儘管這種宗教活動是同西方殖民主義對中國的掠奪和侵略聯繫在一起的，但它與唐代景教和元代基督教羅馬教派在中國的傳教有所不同。此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1552-1814），傳教士支配了歐洲漢學的研究。

關於歐洲漢學的發展，可以有不同的觀點。⁹ 張西平認為應分為三個發展階段：1. 遊記漢學時期、2. 傳教士漢學時期、3. 專業漢學時期。¹⁰

其分類的第一個階段「遊記時期」，主要是一些關於中國的見聞記略。如 William of Rubruck（魯不魯乞，約 1220-1293）¹¹ 在其「魯不魯乞東遊記」中，第一次從歐洲人的視角描繪中國人（“the inhabitants of Cathay”¹²）的語言，如「說話時，他們藉著鼻子呼吸而呼吸得很重」或「像畫家一般用毛筆寫字而在一個字中，有很多字母。」其實，西方天主教第一次傳入中國，是在元朝（蒙古鐵木真於 1206 年建立，1271 年忽必烈定國號為元，1279 年滅宋，定都大都（今北京）。對歐洲人來說，與遠東中國相遇的重要人物就是 Marco Polo（馬可波羅，1257-1324）。他的父親 Niccoló Polo 第二次去中國時，帶了兒子隨行。¹³ 不過有些現代歷史學家與漢學家認為馬可波羅並沒有去過中國，而只是記下了他所聽說的故事。

8 Bernhard Fuehrer（傅熊），〈對歐洲漢學研究現況的省思〉，載於魏思齊編輯，《有關中國學術性的對話：以「華裔學志」為例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頁 134、141-142。

9 參閱 Willy Richard Berger, *China-Bild und China-Mode im Europa der Aufklärung*（啓蒙時代歐洲對中國的看法與流行式樣）（Köln: Böhlau Verlag, 1990），pp. 2-3；另參閱 Andreas Pigulla, *China in der deutschen Weltgeschichtsschreibung vom 18. bis zum 20. Jahrhundert*（18 世紀至 20 世紀德國史料編纂法中的中國）（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6），p. 20。他們提出歐洲漢學發展時期的四個階段：1. 真絲的傳播、2. 早期方濟會傳教士、3. 耶穌會及其他修會的傳教士、4. 旅人與大使。

10 此分類方式參閱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開封：大象出版社，2005），頁 3。

11 參閱 Christoph Harbsmeier, “John Webb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West”（約翰·韋布與西方文言文早期研究史），載於 Ming Wilson and John Cayley (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 1995), p. 297。

12 Cathay 為 Catai 的英文化之詞彙，在英文指「中國」。Catai 原來指「華北」（如馬可波羅把「華南」稱「Manji/ Mangi [Manzi 蠻子]）。Catai 一詞原來意指 Khitan（契丹 Qidan），即遼國，是由契丹人於 907-1125 年間所建立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少數民族王朝。契丹人大多融入其他中國北方的民族，如漢族、女真族、蒙古族等。

13 第二次遠航持續到 1295 年，馬可波羅一家回到歐洲，即定居威尼斯。1298 年他參加威尼斯與熱那亞之間的海戰，戰敗被俘，在監獄裡待了幾個月，他向同獄的夥伴述說中國的經歷，而寫了一本書 *Il Milione*（「百萬」或「馬可波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其語言為 Provençal（普羅旺斯語：古法語），出版之後很快翻譯成其他歐洲語言。

無論如何，他因《馬可波羅遊記》而聞名，他的報告也屬於當時歐洲人詳細的亞洲旅行紀錄。¹⁴

第二階段「傳教士漢學時期」著重於記述傳教士對於中國的深度瞭解與傳教使命。16世紀初，葡萄牙佔領馬來半島後，¹⁵抵達了中國大陸。巴斯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聖 Francis Xavier（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於1552年到達廣東沿海。1557年，葡萄牙傳教士踏上了中國澳門的土地，陸續來到中國。接著，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 Michele Ruggieri（羅明堅，1543-1607）於1579年7月20日左右抵達澳門。而利瑪竇也於1582年從印度應召前往中國傳教，於8月7日到達澳門。他們兩個都遵循 Alexandro Valignani（范禮安，1538-1606）認為進入中國的耶穌會神父應該先學習中國話和中文的要求，開始學習漢語、瞭解中國的風俗習慣，也建設聖瑪爾定經院（St. Martin House / la casa di San Martino），作為西方傳教士們的第一所漢語學校。耶穌會士及之後其他的天主教修會（如道明會、方濟會、奧斯定會、巴黎外方傳教會或遣使會）的會士們都學說漢語，甚至不少也會寫漢字。

第三階段「專業漢學時期」則聚焦於漢學向不同國家之拓展，並成為單獨的學科而發展。我們也可以稱其為「大學漢學」或者「學術／科學」漢學。1814年12月11日法國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正式任命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為「漢、韃靼、滿語文學教授」，成為「歐洲大學漢學」誕生的標誌，至今已有將近200年的歷史。1843年，在法國的巴黎也成立了東方現代語言學院（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開始漢語教學，使得漢學研究具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面貌。自19世紀上半葉起，漢學研究在法國開始蓬勃發展起來，因此巴黎被譽為「西方漢學之都」。¹⁶ 1837年

俄羅斯在喀山大學（今韃靼斯坦共和國的首府）建立漢學系，之後遷到聖彼得堡大學。¹⁷ 1837年，在 George Staunton 爵士的策劃下，英國 Robert Morrison 的圖書館藏書（現有者為倫敦漢學亞非洲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被送到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倫敦大學），作為說服校方聘請一位中文教授的條件。而 The Reverend Samuel Kidd (1799-1843) 出任為第一位教授。不過，所謂「倫敦漢學」的前驅其實為不列顛的外國漢學研究，其基地為印度孟加拉與中國廣州。

19世紀初，在德國有了在大學制度中設立漢學研究機構的機會。當1816年波恩大學（Universität Bonn）正在籌建中時，就計劃設立漢學教授席位（漢學系）。不過被邀請的 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教授卻寧願留在巴黎。但是，波恩大學仍被看作是歐洲第一所，且是唯一一所東方研究中心。1871年是建立德意志帝國的時刻；1887年德國建立了位於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佛裡德里希威廉大學，今洪堡大學 Humboldt-Universität）的 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東方語言研究院），其目標是為那些將要去東方和在東亞地區工作的人，例如官員、軍官、技術人員、教師、商人和傳教士等德國人，提供有關國家的語言和概況方面的知識，而中文從一開始就被列為其重點教學計畫之一。

之後，其他歐洲國家逐漸在其大學制度中建立了漢學系。到現在為止，大概只有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大學中沒有漢學系。這一情況略具諷刺意味，因為葡萄牙及西班牙的漢學研究是屬於歐洲最早期的。

14 這些學者指出馬可波羅的記錄不完全，很常見的東西，如：筷子、茶、裹腳布、長城等都沒有提過。而且，元朝的歷史記錄從沒有提到他是忽必烈的特使，甚至他的名字也不會出現在中國歷史中。可是從另一方面來看，他描述了遠東生活其他的細節，如紙幣、大運河、蒙古軍、老虎，皇家郵政系統的結構。他並且提到中國對日本的古稱，是日本在西方文學裡第一次出現。

15 1511年8月24日，麻六甲在葡萄牙於阿布奎擊敗印度後被征服，並成為葡萄牙人在東印度群島擴張的戰略基地。1641年，荷蘭人得到柔佛蘇丹的幫助，擊敗葡萄牙人並佔領麻六甲。荷蘭入侵期間由印度到中國的海陸通道遭到破壞。荷蘭從1641年到1795年統治麻六甲，但對將其發展成貿易中心並不感興趣；印尼的巴達維亞（雅加達）因而取代了麻六甲，成為治理中心。

16 請參閱 Jean-Pierre Drège（戴仁）主編，耿昇譯，《法國當代中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269-310。

17 喀山大學於1804年建立。參閱閻國棟（Yan Guodong），〈喀山大學與19世紀俄國漢學〉，載於《國際漢學》20.1 (2001): 51-57。

二、歐洲漢學的成就

第二階段「傳教士時期漢學」的精神出現於世界史中歐洲的「現代性」之開端，即有至少四個重要的文化現象：1. 透過歐洲人加強其航海能力，而發現所謂「新世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國；¹⁸ 2. 歐洲人創造現代的自然科學思想，以經驗、歸納法為主的思考模式（物理學），代表人物為 Francis Bacon（法蘭西斯·培根，1561-1626）¹⁹ 及其 *Novum Organum*（新工具，1620 年）；3. 文藝復興作為一場發生在 14 世紀至 17 世紀的文化運動，在中世紀晚期發源於佛羅倫斯，後擴展至歐洲各國，在這裡要特別強調其文學與哲學著作的方面（重新閱讀希臘原文）；4. 在 16 世紀至 17 世紀進行的基督宗教（天主教）的改革，其代表人物有馬丁·路德、加爾文及慈運理，甚或英國國王亨利八世等人，分割了新教與舊教。無論傳教士們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此種現代性的精神，不過他們確實帶來了一種完整的世界觀，而且不僅限於「基督宗教思想」，也包括天文學、醫學及地理學。尤其是，從耶穌會的中文著作也可見歐洲科學分類的教育系統之描繪。在這些記述中，不同的科學學科組成一個整體，並按照順序排列。在 17 世紀的教育系統中，個人起步始於基礎的通才學問（artes

liberales 包括：trivium 三門學科：文法、修辭學及辯證法及 quadrivium 四門學科：算學、幾何學、天文學、音樂），進展到較高的科學學問（醫學和倫理學），最後以神學作結。例如，醫學被認為是理論的科學，讀醫學首先要接受哲學訓練。在此種背景下，比較容易懂傳教士們不只當作第一批漢學家，而且也是作為西學東漸的第一推動者。

筆者於 1999 年回臺灣後，在天主教輔仁大學這一學術環境中，發現自己的使命在於向臺灣學術界介紹西方（歐洲）的漢學研究成果，間接地也介紹給中國大陸學術界，為此也舉辦了不少屆國際研討會。除此之外，筆者也主持了一個三年的計畫，名為「對輔大外語學院各系（六系）相關語言中漢學現況的研究」（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inological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Six Language Departments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92-94 學年度）。²⁰ 從相關的經驗與其他學者的研究報告中，筆者以紀事的方式表述一下歐洲漢學的成績：²¹

1. 1569 年的 *Tratado em que se cõtam muito por estêso as cousas da China* (*Tratado das cousas da China* 《中國概說》，葡萄牙語)，由葡萄牙道明會傳教士 Gaspar da Cruz（克魯斯，約 1520-1570）撰於葡萄牙 Evora；是

18 對當代歐洲人來說，這些中國故事好比是「外星人」的確存在的事實：它是一個前所未聞的偉大文化；它也是一個與西方文化沒有任何關係而獨立發展出來的文化，甚至在《聖經》中也沒有任何關於它的紀錄。歐洲人那時卻只能在資訊有限的情況之下，用想像力與思辨能力回答這些問題。

19 在他的 *Advancement of Learning*（學術的進展）中，作者發揮其符號學理論。此理論認為人類語言符號系統為表達人類知識的關鍵管道，歐洲人因此對人類語言的理念，即原始普遍性與理想的語言重新感到興趣。在此種情況下，他如此描述漢字：「我們進一步瞭解，中國與高遠的累範特（the high Levant）之王國用『characters real』（實在文字）來書寫。總的說來，其不表達字母或詞彙，而直接指涉東西或表達概念。如此不同的國家或地帶，雖然聽不懂各種口語，但是他們都會互相看得懂文字，因為文字的接受範圍超越了語言的擴展範圍。所以他們有非常大量的文字，我猜測其數目應該與 radical words（語根的詞彙）一樣多。」。

20 92 學年度：法文系黃孟蘭，〈法國漢學研究的概況〉；日文系賴振南，〈日本漢學研究的概況——在歷史背景上的報告〉；義文系 Antonella Tulli（圖莉安），〈義大利漢學研究的現況〉。93 學年度：西文系 José Ramón Álvarez（雷孟篤），〈西班牙漢學研究的概況〉；Zbigniew Wesolowski（魏思齊），〈不列顛（英國）漢學研究的概況〉；Zbigniew Wesolowski，〈德國漢學研究的現況〉。94 學年度：Zbigniew Wesolowski，〈美國漢學研究的現況〉。

21 為了提供相關的成績，作者引用以前撰寫的文章中的一些內容：請參閱魏思齊，〈西方早期（1552-1814 年間）漢語學習和研究：若干思考〉（Some remarks on early Western [1552-1814] acquisition and study of Chinese），《漢學研究集刊》8（2009.6）：89-122，尤其 108-113。

- 「現代」歐洲第一本有關中國文化的書。²²
2. 1592 年的 *Beng sim po cam* 《明心寶鑑》²³，由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 Juan Cobo（高母羨，1546-1592）於菲律賓馬尼拉從中文（以閩南語的閱讀法）翻譯成西班牙語；這是歐洲第一本由中文翻譯成西文的書。²⁴
 3. 1592 年之前，由 Juan Cobo 所撰寫的 *Arte de la lengua china*（《漢語語法 / 閩南語語法》；拉丁文書名為 *Lingua sinica ad certam revocata methodum quatuor distinctis caracterum ordinibus generalibus, specificis et individualis; seu vocabularium sinensis*）現已遺失。根據 Matthew Y. Chen²⁵ 的說法，Juan Cobo 應該是第一個撰寫漢語（閩南語）語法的外國人。不過，Henning Klöter²⁶ 認為應該獲得此種榮譽的是 Martín de Rada（拉達，1533-1578），因為是他撰寫了第一本漢語語法 *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中文語法與詞彙》，1578 年之前），但現已遺失。
 4. 1584 年的《天主實錄》²⁷，由 Michele Ruggieri（羅明堅，1543-1607）撰寫於廣東肇慶。
 5.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葡漢辭典》：1584-1588）：²⁸ 此辭典包含約 6,000 葡萄牙語的標題詞，按字母順序安排，1934 年由 Pasquale D'Elia（耶穌會神父德禮賢，1890-1963）在羅馬耶穌會檔案室所發現。²⁹ 這大概是第一本漢語和外國語言的辭典。利瑪竇在這部辭典中第一次使用了所謂羅氏早期拼音系統（RES：
-
- 22 一般來說，大家都把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門多薩，1545-1618）的 *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ino de China*（《中華大帝國史》，1586）看成歐洲第一本有關中國文化與歷史的書（它是第一本歐洲書，呈現一些中國字）。門多薩是奧斯定會的主教，終其一生住在西班牙和墨西哥兩地，從未到過中國和菲律賓。可是奧斯定會的很多傳教士到過中國和菲律賓，所以門多薩有很多這類的書。他在研究過這些書後，寫了「中華大帝國史」。這是一套介紹中國的百科全書。這本書對歐洲的重要性可以從被翻譯為多國語言版本和數目上看出。請參閱（葡）加斯帕爾·德·克魯茲，《中國概述》（Gaspar da Cruz, *Tratado em 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xtenso as Cousas da China*（Macau: Museu Marítimo de Macau & Instituto de Promoção do Comércio e do Investimento de Macau, 1996）。
 - 23 《明心寶鑑》大約成書於元末明初，輯錄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全書有 20 篇。內涵容納儒、釋、道三教學說，薈萃明代之前中國先聖前賢有關個人品德修養、修身養性、安身立命的論述精華和啟蒙書。此書至少在有明一代都是最流行的通俗讀物，也是最受歡迎的勸善書、啟蒙書之一。
 - 24 劉莉美，〈當西方遇見東方——從《明心寶鑑》這本西班牙黃金時期譯本看宗教理解下的偏見與對話〉，載於《中外文學》33.10（2005）：121-131。
 - 25 Chen Matthew Y., "Unsung Trailblazers of China-West Cultural Encounter"（中西相遇中未被贊頌的開路先鋒），載於 *Ex/Change*（香港）8（2003）：8。
 - 26 Henning Klöter, "The earliest Hokkien dictionaries"（閩南語最早辭典），載於 Otto Zwartjes, Ramón Arzápalo Marín and Thomas Smith-Stark (eds.), *Missionary linguistics IV: Lexicograph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ssionary Linguistics, Mérida-Yucatán, 14-17 March 2007*（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p. 5。
 - 27 《天主實錄》（《天主聖教實錄》，1630 年於北京出版）是西方人用漢語書寫的第一部基督教的神學著作。這書最初由羅明堅用拉丁文寫成，由他本人和利瑪竇及一名中國秀才將之譯成中文，在肇慶出版。後來利瑪竇自己研讀《四書》，對中文及中國文化的認識提高以後，作出了大量修訂。書中部分的內容明顯接受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並結合天主教教義和儒家思想。《天主實錄》在 16 至 18 世紀對天主教在中國、日本等地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其內容適應了儒家倫理的概念，比較容易被中國士大夫階層所接受。《天主實錄》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進中國的著作（中國傳統把每月三分為上、中、下旬，或二分為朔望）。
 - 28 參閱 Direccao de Edicao John W. Witek, S.J., *Dicionario Portugues-Chines*（魏若望編輯，《葡漢辭典》）澳門（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IPOR) 東方葡萄牙學會 and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
 - 29 參閱 Federico Masini（馬西尼），*Chinese Dictionaries Prepar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17、18 世紀西方傳教士所編纂的漢語辭典），載於 Wu Xiaoxin (ed.), *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Chinese-Western Exchang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相遇與對話：16-18 世紀間中西交流中變化之透視）（Sankt Augustin, Nettetal: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2005），pp. 185-186。

- Ricci Earlier System 利氏早期系統，沒有聲調的或送氣、帶氣音的符號)；在開始，耶穌會傳教士之所以翻譯《四書》，就是為了教剛到中國的傳教士們學習中文。³⁰ 這些課本教材就是逐字地翻譯，包括：中文原文、拉丁文對照、還有中文拼音，來告訴西方人怎麼發音。羅明堅就是第一位寫這種語言教材的耶穌會士，很可惜的是，在 1588 年當他還沒翻譯完《四書》之前，就被要求返回羅馬。
6. 1598 年的辭典（現在已遺失的中西字典：南京「Quonhua」（官話 *guanhua*）；拉丁名字為 *Vocabularium sinicum, ordine alphabetico europaeorum more concinnatum et per accentus suos digestum*），由利瑪竇、鐘鳴仁（Sebastian Fernandes Tchong, 1562-1621）及 Lazzaro Cattaneo（郭居靜，1560-1640）編纂，有五個聲調符號及一個帶氣音的符號（所謂利氏晚期系統，RLS：Ricci Later System）。³¹
 7. 1605 年的《西字奇蹟》（在中國大陸今改名《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是用羅馬字給漢字注音的四篇文章，從這四篇文章的注音中所歸納出的拼音方式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個用羅馬字拼寫漢語的方式。
 8. 1607 年的《格物窮理便覽》（*Símbolo de la Fe, en lengua y letra China*），原為 *Introducción del Símbolo de la Fe*（Salamanca, 1583），為道明會會士 Luis de Granada（1504-1588）所撰，其後由 Tomás Mayor 於馬尼拉翻譯成中文。這是第一部由歐洲人從西文翻譯成中文的書；比利瑪竇與徐光啓所翻譯的歐幾里德《幾何原本》早一年，即 1608 年。
 9. 1625 年所撰寫的《西儒耳目資》，³² 由耶穌會傳教士 Nicolas Trigault（金尼閣，1577-1629）所著（由王徵於 1626 年在杭州出版）。此著作是第一部採用完整的羅馬字標音漢字（利氏晚期系統）的字典，是明末官話研究的重要材料。
 10. 1640 年的 *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tion castellana*（《漢字詞典及西班牙語解釋》，由西班牙道明會會士 Francisco Díaz（1602-1669）撰寫，包含 7,169 個漢字，並按漢語發音的字母順序排列，它的羅馬拼音為金尼閣系統略加修改之版本，與金尼閣的版本有直接關係。³³
 11. 1653 年的 *Grammatica Sinica* ³⁴（《中國文法》，由 Martino Martini（衛匡國，1614-1661）所撰，作者未曾出版。
 12. 1667-1670 年間：Athanasius Kircher（阿塔納斯·珂雪，1602-1680）出版了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中國圖說》於 1667 年³⁵ 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以插圖說明中國、形繪中國）。在其中他寫道，中國人是《聖

30 關於來華耶穌會的學習過程，請參閱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ter 7: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Birds," pp. 243-286。

31 Federico Masini, 前揭書，頁 186。

32 全書共分為三卷：第一卷《譯引首譜》是總論，第二卷《列音韻譜》是從拼音查漢字，第三卷《列邊正譜》是從漢字查拼音。金尼閣的羅馬字注音方案只用了 25 個字母（五個母音字母，20 個輔音字母）和五個表示聲調的符號，就可以拼出當時「官話」的全部音節。這種比「反切」簡單容易得多的方法，引起了當時中國音韻學者極大的注意和興趣。有的學者還從中受到啟發，產生了中國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設想。此著作是明末官話的一件重要材料。過去有些學者主張《西儒耳目資》所反映的語音是山西或西北的方言，但根據當時天主教傳教士有關中國語言的記述，它的基礎方言為通行於全國的官話是不容置疑的。《西儒耳目資》之後，有一大批漢語詞典的手稿本出現，其中，主要是西班牙語漢語辭典，作為手稿本可能藏在相關修會各檔案館中。

33 參閱 Federico Masini, 前揭書，頁 189-190。

34 參閱 Giuliani Bertuccioli（白佐良，1923-2001），"Martino Martini's *Grammatica Serica*"（衛匡國的《中國文法》），載於 *Monumenta Serica*（《華裔學志》）51(2003):629-640。Martino Martini's *Opera Omnia*（《衛匡國全集》）即將由 the University of Trento 的 Franco Demarchi 教授編輯出版，其中，會有 *Grammatica Sinica* 的部分。

35 請參閱 Boleslaw Szczesniak, "Athanasius Kircher's: *China Illustrata*"（阿塔納斯·珂雪的《中國圖說》），載於 *Osiris*（歐西裡斯），Vol. 10, (1952), pp. 385-411。

經》中所提及的「含」姓後代，漢字則是聖書體傳到亞洲後的變體文字。這個觀點他在 *Oedipus Aegyptiacus* (埃及俄狄浦斯) 中，就已經提到過了。³⁶ 他將漢字列在聖書體之下，因為他認為每個漢字代表一個特殊的意思，而聖書體的符號則代表既神秘又複雜的思想。此本拉丁書於 1668 年翻譯為荷蘭文；英文節錄的版本於 1669 年問世；而 1670 年出版了法文版本。此書主要的特色是兩種附錄：一為 Johann Grueber (1623-1680) 向塔斯卡尼大公對於中國問題的詳細答覆，另一附錄則為篇幅 40 頁的漢法辭典 (頁 324-367)。此辭典為歐洲出版的第一本漢法辭典。³⁷ 它包含約 2,100 項漢語詞彙，此詞彙是以拉丁字母排序的，即從 Ça 到 Xun，沒有相對應的漢字，如 Gîn (今日普通話：ren2) 翻譯成 homme (人)、piet  (仁)，其實二者是不同的詞。

13. 於 1687 年，比利時耶穌會士 Philippe Couplet (柏應理，1623-1693) 主編了《中國人的哲學家孔夫子，或中國知識》(*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1687)。只是《四書》翻譯中沒有《孟子》。

14. 1703 年，Francisco Varo (萬濟國或萬方濟各，1627-1687) 所撰寫的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華語官話語法》³⁸)，為歐洲第一本在廣州出版的漢語語法。是西方漢語研究史上的一部要著。其特色為：

除了漢字頁數之外 (因為這本書問世在中國)，不包含漢字。

15. 1728 年的 *Notitia Linguae Sinicae*³⁹ (《漢語劄記》)，由耶穌會傳教士 Joseph Henri De Pr mare (馬若瑟，1666-1736) 所撰寫。他編寫這部著作的想法是很新穎的，他認為學習中文，不應該太沿襲拉丁文文法的理論和方法，而應該通過實踐來學習。

總括以上的成績，我們可以說傳教士們的貢獻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⁴⁰

1. 1898 年⁴¹ 之前沒有由中國人編著的任何漢語語法書，但是自 16 世紀末起，已有不少歐洲傳教士開始編著中文文法書。其實，對這些著作還沒有做徹底的研究。
2. 漢語作為我們所謂的第二語言教學的學科建設：明清間的傳教士們，由於懷著強烈的傳教使命，先自己主動學習和研究漢語，並為後來的傳教士們編寫漢語教材與語法課本，這種現象激起了一股「漢語熱」。
3. 學習與研究漢語是漢學之基礎，如此才可以繼續建設中國知識之殿堂。

而 19 世紀的「專業 / 大學制度漢學時期」則是以一些抄襲個案開始。比較有名的大概就是 Chr tien-Louis Joseph de Guignes (1759-1845) 於 1813 年僅以他自己的名字出版了一本辭典，⁴² 然而其內容多半是根據 Basilio

36 他也引用《聖經》建立了一個諾亞家庭殖民全世界的故事。他認為大洪水後諾亞的兒子含來到波斯，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殖民地。他認為含就是查拉圖斯特拉，其國土一直延展到印度和蒙古。其鄰國中國則是含最後殖民的國家。Athanasius Kircher 稱此時第一位中國皇帝伏羲從含那裡接受了聖書體並將它發展為漢字。按照他的計算這發生在大洪水後 300 年的時間。

37 參閱 Federico Masini (馬西尼)，"Notes on the first Chinese Dictionary Published in Europe (1670)" (歐洲 1670 年出版、第一本漢語辭典)，*Monumenta Serica* (《華裔學志》) 51(2003): 283-308。

38 (西) 瓦羅著，姚小平，馬又清 譯，前揭書。原文為：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華語官話語法》)，由 W. South Coblin 及 Joseph A. Levi 所翻譯，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39 參閱 *Th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of Pr m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 G. Bridgman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7) (Prin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Lightning Source UK Ltd: Kessinger Publishing's Legacy Reprints, 2007 年)；原拉丁文版本於 1831 年在馬六甲出版。

40 請參閱張西平等編，《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調查》(上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

41 1898 年馬建忠 (1845-1900) 出版《馬氏文通》一書。該書以西方語文的語法為本，對照從古書中精選的例句，研究古漢語的語法規律，創建了一套漢語的語法體系，是奠定漢語語法學基礎的開山之作，對後世漢語語法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

42 J. De Guignes,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ais et latin* (《法、拉丁、中辭典》) (Paris 1813), pp. LVI-1114.

Brollo da Gemona (葉尊孝, 1648-1704)⁴³ 收藏在梵蒂岡圖書館的手抄本而來。他的抄襲後來被 Abel-Rémusat 和 J. Klaproth 所發現。⁴⁴ 因為 19 世紀歐洲漢學發展很迅速，無法以成績作出較為適當的紀錄。大概最重要的特色之一為不再以儒家傳統為最重要的研究對象，而也包括了其他中國文化傳統，如道家或佛教。19 世紀歐洲漢學研究其他方面之特色有以下幾點：

1. 因為缺少中文專業書籍和資料，所以較依靠中國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如 1317 年的《文獻通考》（宋元之際馬端臨撰，共 348 卷，記載上古到宋寧宗時典章制度的沿革）。
2. 翻譯工作為漢學研究的重點，如 James Legge（理雅各，1815-1897）的儒家經典翻譯和法國耶穌會 F. S. Couvreur 的翻譯工作。
3. 研究對象及範圍逐漸跨越儒學而走到其他傳統，如道家、道教、民間信仰或文學（John F. Davis, *Poesis sinicae commentarii*《漢文詩解》，1834 年）、戲劇資料等。
4. 工具書的寫作：如文法方面（Georg von der Gablentz（加貝倫茨、嘉貝蘭，1840-1893 的 *Chinesische Grammatik*《漢文經緯》，1881）、詞典方面（F. S. Couvreur 的《中法文言文詞典》，1898）；其他方面如 W. P. Mayers 的

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中文之者手冊》，1874），H. A. Giles（1845-1935）的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名人辭典》，1898）等。

19 世紀歐洲漢學研究的最大發現是漢語與藏語和緬甸語之間的某種相似之點（都屬於漢藏語系）。此方面貢獻歸屬於英國人 B.H. Hodgson（1800-1894）、德國語文學家 Ernst Kuhn（1846-1920）及德國漢學家 August Conrady（1864-1925）⁴⁵。19 世紀歐洲漢學已創立了第一種⁴⁶學術性期刊《通報》（*T'oung Pao*, 1890），是法國與荷蘭的漢學學誌。

20 世紀的歐洲漢學研究成了一個獨立和完整的學術領域。其特色為：

1. 漢學研究吸取當代人文科學中的批判方法（尤其社會學和民族學方面），如法國學者 Edouard Chavannes（沙畹，1865-1978）、Paul Pelliot（伯希和，1878-1945）和 Marcel Granet（葛蘭言，1884-1940）或 August Conrady；此種研究趨向已將漢學看成一門「交叉科學」，即區域研究與專業學科（如社會學）之間的張力關係。
2. 對漢語歷史研究之加強：在現代語音學及音韻學的幫助下，人們開始研究漢語語聲及其歷史發展之脈絡，

43 1694 年和 1699 年的兩本辭典：第一本為 *Han çu si ye. Sinicarum litterarum europea expositio. 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 suis fratribus sinicae missionis tyronibus elaboratum per Fr. Basilium a Glemona Ord. Minorum stric. Observ., venetae Divi Antonii provinciae alumnum, A. D. 1694*（《漢字西譯：以歐洲方式解釋中國字，漢語拉丁文辭典》），由義大利方濟會會士 Basilio Brollo da Gemona（葉尊孝，1648-1704）所編，為歐洲第一本中文拉丁文字典，包含超 7,000 個漢字，未曾出版；它是按照部首而安排，有漢字，下面有拼音，旁邊有意義也有解釋，還有例句，就是雙音節的例句和同義詞。第二本（1699）是 *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 in quo litterae sinicae ordine alphabetico dispositae explicantur, adiunctio quoque indice ad easdem litteras inveniendas in fine, compositum a Ie Xin-fu, minorita italo, vicario apostolico, Revmo P. Pasilio a Glemona Ord. Min. S.P.N. Francisci Reform., et ab alio Ie Xin-fu. Frate Io. Baptista a Serravalle, missionario apostolico in provincia Xensi dcriptum*。此辭典也是按拼音收錄超過 9,000 個不同的漢字，每個漢字旁邊寫上拼音、拉丁文意義和例句，Brollo da Gemona 未曾出版之。Basilio Brollo da Gemona 注意到「量詞」這個詞類，而他把一百多個不同的量詞逐一解釋和漢語語詞的連接方式，解釋的非常清楚。這部辭典可能是早期傳教士所編最完整的一部辭典。

44 早一些有 Etienne Fourmont（1683-1745）的案子，他的 *Grammatica Duplex*（1742）被 Abel-Rémusat 認為是太依賴 Francisco Varo 的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

45 如其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e-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1896）。

46 早已有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舊譯《澳門月報》），是為西方傳教士在清末中國創辦的一份英文期刊，由美部會的傳教士 Elijah Coleman Bridgman（裨治文，1801-1861）創辦於 1832 年 5 月，主要發行地點是廣州。《中國叢報》在鴉片戰爭期間一度搬到澳門及香港，1845 年再移回廣州。除了創辦者裨治文之外，1833 年美部會另一位傳教士 Samuel W. Williams（衛三畏）開始在廣州負責處理《中國叢報》的刊行事務。1847 年之後，該刊的編撰即由衛三畏代裨治文負責。1851 年 2 月停刊。請參閱尹文涓，〈《中國叢報》與 19 世紀西方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22.2（2003.5）：28-36。

如 Bernhard Karlgren (高本漢, 1889-1978) 和 Henri Maspero (馬伯樂, 1883-1945)。後者從歷史語言切入, 以文法差異, 尤其以方言與地域的關係而確定《左傳》作者非齊魯人。

3. 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之開端：1898 年在河南所發現的甲骨文及其辨認和破譯工作能更多的幫助瞭解中國商朝之歷史。此方面，歐洲學者繼承了中國學者，如孫詒讓（1848-1908，清經學家、文字學家）、王國維（1877-1927，中國學者；1913 年起尤致力於甲骨文、金文和漢晉簡牘的考釋）、羅振玉（1866-1940，中國金石學家）、董作賓（1895-1963，中國甲骨學家）等的研究成果，開啓了漢學中的一個特殊的研究範圍——古文字學（其內涵和埃及學中象形文字研究接近）。
4. 中亞手稿的發現，如敦煌佛教變文（包括唐朝白話的中文在內），要求漢學家掌握多種很難解讀的語言（此種漢學研究類似學習古典語言學中，對用莎草紙繕寫文稿之研究）。
5. 基於中國史料而進行批判性的研究，如 Otto Franke（福蘭閣，1863-1946）。
6. 除了法國、德國外，其他歐洲國家，如荷蘭和英國也推動及拓展了漢學研究。
7. 漢學方面學術性期刊也大有發展。除《通報》外，還有：法文的 *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遠東法國學院學報》，越南河內，1901）；*Bulletin of the of Eastern Antiquities*（《遠東古代文物博物館館刊》，瑞典斯德哥爾摩，1929）；*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華裔學志》，北京，1935），德國出版的刊物：*Asia Major*（《大亞洲》，1923）；*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東亞期刊》，1924）；*Sinica*（《中國研究期刊》，1925）。

從 1930 年代以來，美國的漢學或「中國研究」對到那時為止一直佔有優勢的歐洲漢學形成了很大的挑

戰。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出現了反對純學術即傳統漢學的中國研究。此新的中國研究始於二戰之後的「敵情研究」（也包括日本、以前蘇聯、中國和韓國）。就中國而言，當時在美國有一大批人才如 Benjamin Schwartz（史華慈，1916-1999）及其老師 John K. Fairbank（費正清，1907-1991），他們各自努力把漢學轉向現代中國研究，而他們的研究至少有三個特色：1. 使中國研究成為與現實有關的學科領域；2. 研究方向為：自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從現代進入清朝，如此可在時代演進上，一層一層地追溯；3. 研究經費來自美國國防預算。⁴⁷

三、歐洲漢學現況⁴⁸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之現代歐洲漢學發展趨勢之外，也出現了學術風氣的移轉，使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國語文學、哲學及文學研究被認為已經過去，而不再具有吸引力。以上我們已經提到了美國對中國研究的模式，可以把這種手法叫做洋蔥式研究途徑，即從現況一層又一層地回到過去。不過，這模式也有其限度，譬如一個研究者在其研究中，一輩子不會回到太古老的歷史階段。以團隊合作的方式處理這任務，可能比較容易做得到。

另一個特殊現象為，注重漢學研究的「歷史性」。歐洲各國的漢學史，已經有若干論文與專書的詳細記載。⁴⁹ 關於美國漢學成為西方漢學的主流及對歐洲漢學的影響力，可以引用 Wolfgang Kubin（顧彬）的看法：「美國漢學的主流，特別是在現代、當代漢學研究領域中，主要追隨著兩種預定的思想和一種延續下來的方法，即：政治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後殖民主義話語以及一個由歷史延續下來的、很成問題的教科書學術方法（教科書學術加上即時實用文學理論）。」⁵⁰ 對他

47 請參閱 Wolfgang Kubin（顧彬）的描述於他的〈漢學，何去何從？試論漢學現況〉，載於林志明、魏思齊編輯，《輔仁大學第二屆漢學國際研討會——「其言曲而中：漢學作為對西方的新詮釋——法國的貢獻」論文集》，頁 303-304。

48 請參閱「附錄一：主要歐洲漢學/中國研究協會網頁」、附錄三：當代不列顛（英國）、德國與美國三個西方國家中漢學研究的特徵」（由於篇幅所限，僅呈現於本文電子版文末，詳見「漢學中心出版品全文資料庫」<http://ccs.ncl.edu.tw/ccs/TW/ExpertDB7.asp>）。

49 Bernhard Fuehrer（傅熊），〈對歐洲漢學研究現況的省思〉，前揭書，頁 135-136。

50 Wolfgang Kubin（顧彬），前揭書，頁 304。

來說，政治正確性與後殖民主義表現一種美國學者的研究態度，即以「沒有什麼不同」這種論點來論述中國與西方原則上的平等。教科書式的學術方法也有問題，其將知識標準化，即制定「技術標準」並就其達成「一致意見」。其結果是對學術思想多元化的不尊重。

在現代全球化過程中，歐洲漢學無論是在大學制度內外，都逃不了速度越來越快的國際化，其媒介語言為英文。所以國際研究社群越來越以英文為主要語言，幾乎不留意以歐陸語言發表的研究或翻譯作品。不少歐洲漢學家，為了提升其知名度而用英文發表他們的著作。此外，我們也有一些國際合作與協同研究計畫，跨國家的贊助機構和基金會對此趨勢大力支持與鼓勵。在教學方面，我們也看到國際化的趨勢：「以前沒有學士學位，現在已增設（或即將開設）大學部課程。同時也將學士、碩士、博士課程要求調整至與歐洲各國同一標準。這些修正造成學生流動性提高。在甲國攻讀學士、乙國攻讀碩士、丙國攻讀博士的學生持續增加。」⁵¹

無論如何，漢學或其他學科領域，尤其是人文科學的最大挑戰，還是來自社會變革中的高等教育。「在目前把高等教育視為商品的功利取向的同時，我們觀察到大學教育品質和大學作為研究機構的角色都不斷地沈淪。……基於大學能夠也應該當作企業來經營的假設，成本成為大學活動最主要的考量。學生人數、學生繳學費所得的收入以及（在部分情況之下）政府補助決定某些課程的命運。每一門課收多少學生才『合乎成本』……。這種量化思考方式限定了最不具經濟價值的學科，為了和學術完全無關的理由，質疑開設某門課程和學程的『必要性』。」⁵²

四、歐洲漢學的未來發展

歐洲漢學的出路何在？以下筆者提供一位荷蘭漢學研究批判者 Hans Kuijper 的看法：

第一、筆者也深信未來的漢學家（或者所謂中國通/中國專家）應該多做翻譯工作，因為漢學是以實際漢語（尤其書面語言/漢字）為基礎，對中國文化的任何層面進行研究並獲得研究成果。雖然翻譯是一種謙卑的工作，但它確實是無比重要的（請參閱附錄二：待譯的中文哲學著作）。⁵³ Hans Kuijper 說：「漢學家的長處是翻譯，研究工作絕對是漢學的弱點。因之，他們要專注於前者，而為後者和真正的專家結盟。」⁵⁴ 這地方再要強調：漢學作為「交叉科學」應該跟相關專業學科領域，如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等，進一步交談對話。

第二、Hans Kuijper 在研究計畫方面，提出三項建議：1. 「『一部新的中國哲學史』意味著可以歷多年而仍能據之以為標準的、可以與『西方』最優秀的哲學歷史著作相媲美的一本著作。它是一部連貫一致的敘述，其中主要的主題旋律一再出現，悠揚反覆，清晰可辨。單純的並置羅列儒教思想、道教思想、佛教思想、和毛澤東思想並不能組成一部中國哲學史；它應該包含有關中國的各個哲學領域。我心目中理想的合作研究計畫為一批判性的深入研究，重視哲學一如重視『歷史』，並能評估社會文化的背景。因為行為影響的概念能於此背景中興起、發展。」⁵⁵ 進一步而規劃相關的「世界哲學」，其中有完整的中國哲學部分。2. 「以『系統化』手法研究儒學亦是迫切需要之事務。如此一來，重點就在於緣於『孔子之道』的倫理學，並主要與道德原則相關聯（推而廣之，則是和政治原則相關）。探討儒家、道德原

51 Bernhard Fuehrer（傅熊），〈對歐洲漢學研究現況的省思〉，前揭書，頁142。

52 同上，頁143-145。

53 由於篇幅所限，「附錄二：待譯的中文哲學著作」，僅呈現於本文電子版文末，詳見「漢學中心出版品全文資料庫」<http://ccs.ncl.edu.tw/ccs/TW/ExpertDB7.asp>。

54 Hans Kuijper，〈對中國研究的批判性分析〉，載於林志明、魏思齊編輯，〈輔仁大學第二屆漢學國際研討會——「其言曲而中：漢學作為對西方的新詮釋——法國的貢獻」論文集〉，頁379。

55 同上，頁381。

則的根源思想則必然要獻身研究形而上學和認識論的議題，也即是實在（Que suis-je? 何謂我？）和知識（Que sais-je? 我知道什麼？）的永恆關係的問題。就此，儒學的答案何在？我們或許應該嘗試一些適於時代風向的比較研究，標題為儒家和基督宗教的倫理學比對研究，這類研究的最高理想則是視自我實現為主調。」⁵⁶ 3. 「現代化的腳步已漸漸跨出歐洲的範圍，而擴散到全球，此過程謂之西化。西化的過程導致本質的變動不安，導致全球國家體系間的緊張氣氛。如同地表的地殼運動，這些變動和緊張有時則積聚成形，造成致命的火山爆發或地震。要成為現代化國家，似乎就意謂要變成一個西方化的社會，然而非西方的社會在此項議題上幾乎沒有任何選擇。作為西方勢力的殖民地或合夥人，這些國家常發現自身就是朝著西式的方向『發展』。即使對確曾存在過其他的選項、或目前仍有其他選項的國家，一般的議論仍認為現代世界唯一可行的社會型態為『工業』社會；於過去然，於今日亦然，日本和中國可分別作為代表。日本經過工業化而躍升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而今日的中國也走上同樣的道路。為求成功，經濟的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是否要攜手同行，此議題尚未有完整的答案。」⁵⁷

第三、對漢學的研究方法，Hans Kuijper 認為：「就此而言，我們或可結論，地理學、歷史編纂學和社會學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的連結體（整體）。不過，至此我們就碰到核心問題：人是自然、歷史和社會的一部分（a part），人也同時超越（apart from）自然、歷史和

社會。為公平起見，我提出四個面向的研究方法，謂之（正）四面體（tetrahedron），引此為嶄新的研究模式。其實，此種正面體已經為柏拉圖和歐幾裡得所操作。」⁵⁸ 其中，人作為「認識主體」受到重要的地位。Hans Kuijper 所推動的研究模式為：「……極力擁護的研究方法並非多學科領域的研究（multidisciplinary），而是特別強調『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或『超』領域（transdisciplinary）的手法。因為前者塑造的是拼貼式的研究結果（敘述成串，交集為零）；後者則能照亮到整體的統一結構。我們所需的並非是訓練拙劣的語音學家的不協調演出（不和諧音），而是『專業演奏家』的『協調』演出（和諧音）。『整合』其實是勝於『聯合』，『並列』其實還談不上『合』成法。此間分野甚明，任一作曲家、建築師、編舞家、畫家、時裝設計師、舞臺指導、攝影家、影片編輯、小說家及廚師皆可輕易辨明。」⁵⁹

總括以上的內容，筆者在此要引用 Bernhard Fuehrer（傅熊）的說法來激起論辯：「……評估漢學發展史或發展現況時，必須探討和目前學術研究相關的幾個議題：

1. 漢學研究在持續進行的學術論戰中站在哪個位置？
2. 最先進的特定漢學研究主題在哪个方面能夠、或者已經尋求對目前研究興趣之解答有所貢獻？
3. 漢學研究對研究方法的發展是否有貢獻？
4. 漢學在整個學術界中扮演著什麼角色？

很明顯地，這四個疑問曾經也仍然促使我們潛心苦思。」⁶⁰ 當然，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也將形成漢學的現況與未來。

56 同上，頁 382。

57 同上，頁 385。

58 同上，頁 389。

59 同上，頁 387。

60 Bernhard Fuehrer（傅熊），〈對歐洲漢學研究現況的省思〉，前揭書，頁 138。